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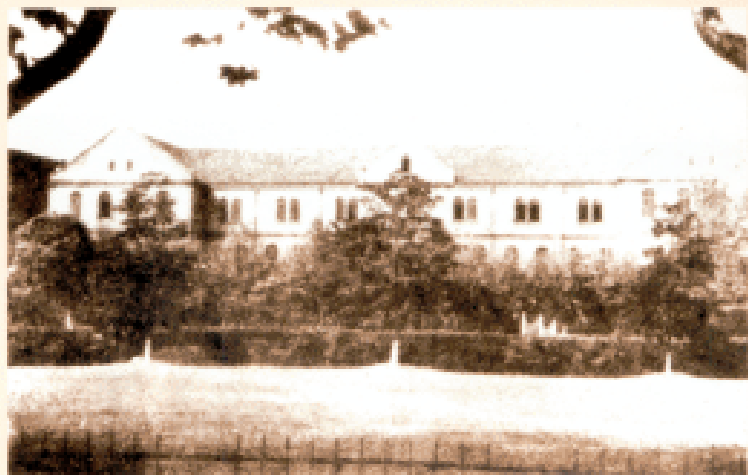
徐汇公学又名圣依纳爵公学（即今徐汇中学前身），建于1850年，是天主教在上海创办的早期教会学校，图为徐汇公学旧址。



江南制造局翻译处是晚清重要的翻译机构，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



1863年设立的上海同文馆是上海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1870年迁入江南制造局，后改名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图为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格致室。



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的雏形。图为上海南洋公学旧址。



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是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图为经正女学师生当时的合影。



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图为爱国学社时期的蔡元培。



1902年冬，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蔡炳麟、黄炎培等任教员。图为该社师生在开学时的合影。



1902年冬，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创办爱国女校，图为开学典礼，后排左五为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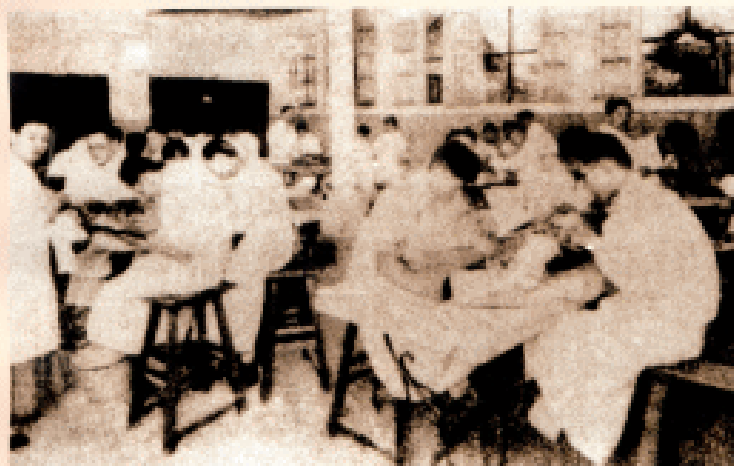
爱国女校部分毕业生当时的留影



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的创始人  
马相伯（1840—1939）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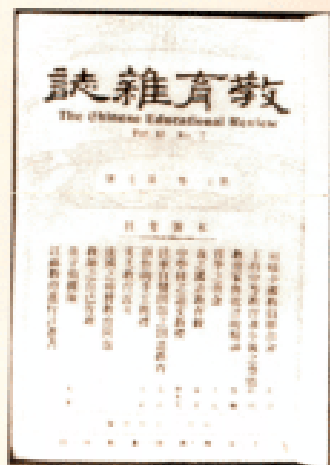
圣约翰大学为美国基督教在上海  
创办的教会大学，原名圣约翰书院，  
1905年改名圣约翰大学。图为圣约翰  
大学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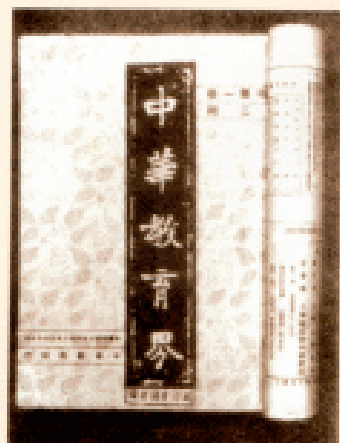
震旦大学是天主教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大学，初名震旦学院，1932年定名震旦大学。  
图为震旦大学医学院解剖室一角。



1901年在上海创办的《教育世界》，是我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图为《教育世界》第125号封面。



1909年创办于上海的《教育杂志》，是我国近代发行时间最长、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教育月刊之一，图为《教育杂志》封面。



1912年在上海创刊的《中华教育界》，为我国近代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教育刊物之一，图为《中华教育界》封面。



1917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社团，图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



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图为上海大学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第一院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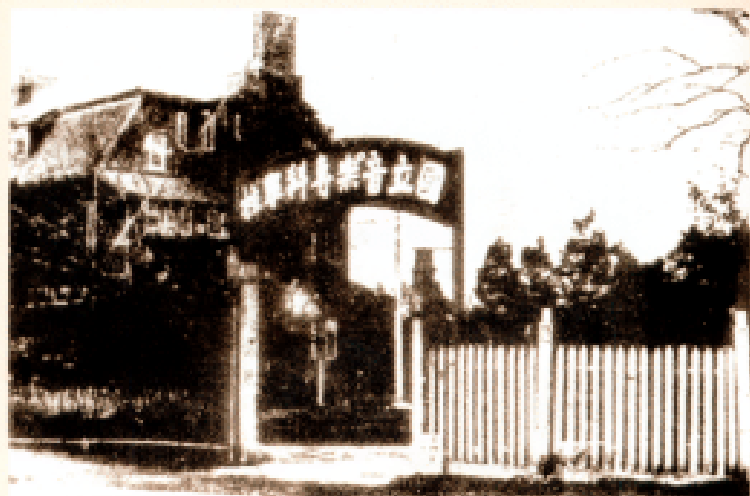


1924年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合影

前排左起：洪野（1）陈抱一（2）陈望道（3）杨明轩（6）刘大白（7）于右任（8）  
邵力子（10）何世桢（13）邓中夏（16）

中排左起：陈铁庵（3）李瑞峰（5）瞿秋白（8）

后排左起：许德良（1）周建人（2）沈雁冰（3）田汉（7）施存统（8）韩爱民（9）  
向汗（10）萧吉云（11）邱青钱（12）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培养高级音乐人才的学校。原名国立音乐院，1927年11月创办于上海，1929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为抗日战争时期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临时校址。



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上海真光幼稚园的儿童在教师带领下开展游戏活动

# 上海近代教育史

陈科美 主 编

金林祥 副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近代教育史

陈科美 主 编

金林祥 副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15 印张 0000 字数 00,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0 本

ISBN 7-5320-8884-7/G·8831 定价: 00.00 元

## > 绪 论 <

如果说中国近代教育史是一部学习西方教育,使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逐步实现近代化,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近代新教育的历史的话,那么,上海近代教育史可以说是这部恢弘历史的一个窗口和缩影。

上海近代教育的发展既有外力的推动,也建立在传统教育的根基之上。历经漫长的岁月和沧桑巨变,上海由一个无名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东南名邑。她由浦而得名,进而由镇而县而市。南宋末年,上海镇建立。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设上海县。1927年设立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称上海市。上海的学校教育始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上海人唐时措、唐时拱兄弟建立的“古修堂”,即镇学。上海建县后,镇学升格为县学。从此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随着上海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上海的教育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县学渐趋完备,与县学并举的书院、社学和义塾纷纷设立,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也得到了增益发展。同时,由于上海内外交通便捷,外国人和传教士不断来华,中西文化的沟通逐渐加强。明代的徐光启不仅是中国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第一人,而且开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先河。这些都是上海近代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当然,只有在开埠以后,上海教育才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11月,上海被迫开埠。自此以后,上海教育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近代转型,上海近代教育由此肇端。1863年(同治二年),李鸿章奏准在上海创办培养外交翻译人才

的上海同文馆(后改名上海广方言馆),成为上海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随后,又陆续设立了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和上海电报学堂等。在官办新式学堂陆续创办的同时,上海开始出现由中外绅商兴办的新式教育机构。其中,1876年(光绪二年)开办的格致书院,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韬曾担任山长长达12年之久;1878年(光绪四年)创立的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此外,上海还开设了各种培训学校、培训班,有日校,也有夜校。这些教育机构教授内容实用,上课时间灵活,入学对象没有年龄限制,以适应普通市民提高文化知识和学习实用技能的实际需要。洋务运动时期的上海新教育,虽然在总体数量上还不占优势,但已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洋务派苦心经营多年的洋务事业、希冀中国富强的梦想由此宣告破灭。《马关条约》的签订,导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激起了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在他们的推动下,要求改革社会,挽救国家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神州大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上海是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他们立学会、办报刊,大量翻译西书,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同时,积极兴办各类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培养新式人才。上海新教育的成就令人瞩目:南洋公学师范院首开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其外、中、下三院孕育了中国近代学制的雏形;经正女学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这期间,上海还涌现出盛宣怀、经元善、钟天纬等著名教育家,他们为上海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维新运动时期的上海教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清末“新政”时期,上海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书院、义学等旧式教育机构相继改为学

堂,新式学堂不仅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办学质量也空前提高。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罗振玉在上海首创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大量译介西方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成为系统传播西方教育的一个早期的窗口,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创建以及新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清末期间,商务印书馆编辑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无论在门类、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居于领先与权威地位,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教科书的发展。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成立的设在上海的江苏学务总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是清末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省级教育团体,在新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这个时期上海的封建教育体系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新教育体制。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在准备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社会教育,创办报刊,进行革命宣传,其中“《苏报》案”震惊全国。他们还直接创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著名的如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此外还有中国公学与健行公学等。前两者由中国教育会创办,中国教育会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建立的第一个爱国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不仅为上海近代教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辛亥革命后,上海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民国初年都有长足发展。继《教育世界》之后,上海又有两种大型综合性的教育期刊《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分别于1909年和1912年创刊,并畅销全国。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发行时间最长、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两份教育期刊,对上海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蔡元培与上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蔡元培的一生中,他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16年之多。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上海从事革命教育,发表重要教育论文,筹划全国教育

改革,为上海教育,更为民初全国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是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空前活跃的时期。西方教育理论蜂拥而入,诸多教育流派争奇斗艳,各种教育实验层出不穷,众多教育团体、教育刊物纷纷出现。上海因其特殊地位,发挥了“窗口”和“集散地”的作用。1915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此前后,在上海创办的《新教育》等各种教育报刊有20余种。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杜威(John Dewey)、罗素(Bertrand Russell)、孟禄(Paul Monroe)等世界著名教育家纷纷应邀来华讲学,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他们都把上海作为讲学或教育调查的重要地点。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的代表杜威到中国的第一站,所作的第一场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就是在上海。与此相关,上海先后引进了在西方流行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分团教学法、教育测验和智力测验等新教学方法和测验方法。其中道尔顿制率先由上海的《教育杂志》予以介绍,并由舒新城主持,最早在中国公学中学部开始试行,进而推广到全国许多学校。上海是介绍和推广道尔顿制的基地。平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各种教育流派在上海广为流布,竞相斗艳。随着各种教育思想的传播,各种教育团体也纷纷成立。1917—1927年的十年间,上海新成立的“新教育共进社”、“平民教育社”等教育团体有20多个。特别是1917年5月黄炎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上海为基地,在全国大力倡导和积极推行职业教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其在上海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在工人聚居区创办的工人平民学校(如沪西小沙渡路工人补习学校等),还是各种干部学校,如平民女校、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都有卓著成绩,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和全国各地开展各项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旨在实行一党独裁的“党化教育”(后改称“三民主义教育”),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和教育思想的统制,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教育仍在缓慢向前发展,新建、扩建和改建了不少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伸出了侵略的魔爪,中国又一次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教育界与全市各界人民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在此期间,杨贤江在上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造。他先后出版了《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两本著作,为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做出了创造性贡献。陶行知在上海提倡普及教育,从事“科学下嫁”工作,创办工学团,发明“小先生制”,产生很大影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受战争影响,上海教育遇到了巨大困难。然而在广大市民和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上海的学校教育事业仍然有所发展。1937年11月,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部分学校内迁,更多的学校则留在上海,它们克服种种困难,依然坚持教学活动。在一段时间内,租界“孤岛”弹丸之地,却集中了各类学校330多所。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曾恢复了短暂的和平,学校纷纷迁回原地,恢复原校名,教育当局也采取了种种整顿和发展教育的措施,学校和学生数量都有明显增加。然而不久,内战爆发,上海教育重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上海教育界广大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争取和平民主和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生。因此,这个时期的上海教育,表现出教育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明显特点。

上海开埠以后,英、美、法等国相继在上海建立租界。上海的租界始于1845年设立的英租界,至1943年收回,前后历时近百年。有

租界便有租界教育。本书所讨论的租界教育,指的是在租界范围内,由租界当局主办的学校教育,而不包括租界内由中国人开办的学校教育。上海的租界教育肇始于1886年设立的中法学校。租界教育是上海近代教育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就发展过程而言,以1927年为界,上海的租界教育可以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概言之,前期发展缓慢,学校数量少,主要以外国侨民儿童为主,歧视华人现象严重。后期在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主持下,租界教育变化较大,不仅华童学校数量增加,而且在教育内容、方法和管理等方面也有较大改进。

上海设立教会学校不仅早于租界内的学校,甚至还在上海开埠之前。从目前已有的资料看,1839年(道光十九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漕宝路设立读经班(后改为民新小学),为上海教会教育之始。上海的教会学校不仅设立时间早、历史长,而且数量多、种类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还设有贫儿院、孤儿院、童养院和育婴堂等。被誉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马相伯,爱国爱教,曾屡次毁家兴学,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与复旦公学(后改为复旦大学),对发展上海的教育功不可没。从办学者的主观目的来说,上海的教会学校主要是为了扩大宗教影响,培养神职人员和教徒,甚至还有企图控制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野心。在实际办学中,教会学校也自成体系,不受中国政府管理(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此种状况有所改变)。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教会学校也存在重视宗教课程、宗教活动,限制学生参加校外社会活动,重视外语教学,轻视本土文化学习等弊端。然而在另一方面,教会学校是上海最早的新式学校,它作为西方教育在上海的一个“窗口”,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一直起着示范效应,对于上海教育的近代化,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1843年11月开埠,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一百余年的

发展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上海的近代教育具有以下主要特性:其一,创新性。上海近代教育敢于突破传统的陈规旧习,勇于求新、创新,敢为天下先。如上海格致书院、正蒙书院、经正女学、南洋公学等新式学校的创办,《教育世界》等教育杂志的创刊,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等等,在全国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其二,开放性。上海近代教育的创新性得益于它的开放性。上海近代教育既向国内开放,更向世界开放,成为输入西方教育的“窗口”,中西教育交汇的前沿和融合的基地。其三,兼容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教育,平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各种不同的教育流派和教育理论,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分团教学法等各种教学方法,都能在上海落脚生存,并能较为从容地相互比较、交流、融合。因此,上海近代教育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繁花似锦,精彩纷呈。其四,实用性。上海近代教育重视为社会进步服务,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强调与民生日用相联系。因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率先在上海提出,职业教育以上海为基地,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上海近代教育实用性的突出表现。其五,灵活性。上海近代教育的灵活性表现在办学的各方面。如在办学的主体上,既有公办、团体办,也有私人办,而且以私人办为主。在办学形式上,既有普通教育,也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既有正规学校,也有大量补习学校、函授学校,甚至还有工学团等。在入学对象上,既有青少年学生,也有失业青年、在职人员。在学习时间上,既有日校,也有夜校、晨校、午校和星期日学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办学灵活多样,适应了各种不同的需要。上海近代教育的上述特性,是上海近代城市特点的重要反映。它们是历史积淀的宝贵财富,是上海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

上海近代教育不仅为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实现历史性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上海近代教育实际上担当